

国学思潮丛书

Guoxue Sichao Congshu

第四辑

返本开新



FANBEN KAIXIN

贺昌盛 主编

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或文化都只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他文明或文化互相比较参证。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或相类的事象在其他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也越能深入。对于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者也仍然应该各就所需，多方吸收。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国学思潮丛书

Guoxue Sichao Congshu

第四辑



返本开新

FANBEN KAIXIN

贺昌盛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返本开新 / 贺昌盛主编. —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4. 10

(国学思潮丛书 ; 4)

ISBN 978-7-5536-2422-8

I. ①返… II. ①贺… III. ①国学—研究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694号

国学思潮丛书

第四辑 返本开新

贺昌盛 主编

责任编辑 冯傲雪

责任校对 陈之江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印务 温劲风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310013)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插 页 1

字 数 301 000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2422-8

定 价 40.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电子邮箱 zjj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任何一个专属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国学”之称也是如此。从内涵上说,“国学”乃学术之一种,这一点当属共识,已无可置疑。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学”一语总是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呢?个中原因也许恰恰是出在为这一概念做出外延规定的“国”字上。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所谓“国”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国”在先秦时期指的其实是“邦”或者“城邑”,秦汉以降则是指“王朝”。但无论是“城邦”还是中央集权性质的“王朝”,其基本形态都与现代性发生以后所出现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因为现代意义的“国”至少兼有“地域所属(Country)”、“民族种性(Nation)”和“政权体制(State)”三个层面的所指,与“Country”意义上的“城邦”或“State”意义上的“王朝”均有着根本的差异。“国”这一概念在西语语境中各有其所指,但在汉语语境中,所谓“国”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正因其把“地域所属”、“民族种性”和“政权体制”这三重所指完全统合在了一起,所以才造成了与之相关的诸多概念的歧义与含混,“国学”之争即源出于此。

作为学术之一种,“国学”在“国”的三个不同层面上是有其各自不同的边界和意义的。从“Country”层面上讲,凡属该“国”之“地域所至”范围内所产生的全部文化产品(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性的)均可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此种研究可视为“区域研究”或“地缘研究”之一种;而从“Nation”的层面上看,“国学”则必须以特定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其核心重在突出此一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特性,并以此融入多元文化形态之间必要的对话;再从“State”的意义上来说,“国学”在接受特定政权体制保护的同时,实际上也承担起了为此一政权体制提供维护其体制合法性及利益延续性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的功能。换言之,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立足于其所认可的层面视自身的界定为真正的“国学”,同时指责除自身所立足的层面以外的所有

研究为“非国学”。

公正地讲,“国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古”(为往圣继绝学),或者是在后殖民思想刺激下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的复活(去西方化)。事实上,“国学”恰恰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学”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代名词。“国学”以其对“民族—国家(Nation)”的认同一直在积极参与着现代民族国家自身的建构,这一点,我们从“国学”最初的诞生及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上即可见出。

中国古代的学术一般统称“经学”,宋代以后则被转换成为“理学”,但“理学”并不是对“经学”的否定,而主要是对“经学”给予重新规范,使之逐步趋于专门化和系统化。无论是“经学”还是“理学”,都可以归入传统(古典)解释学的范畴。中国传统学术的真正分化当始于清代。乾嘉时期,出于汉族学者对满族政权的相对规避,一部分学者开始将学术引向对传统经籍的校勘汇证,这就是所谓“汉学”;而另一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由程朱所开创的对于传统“经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即所谓“宋学”。“汉宋之争”即源于孰为学术正统的争辩。为了平息这场争辩,清代中叶,以方苞、姚鼐、刘大魁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才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术路向既可独立亦可并举的调和主张,其后继者曾国藩又补充提出了“经济”一途,至此,中国传统学术才出现了“分科而治、合而为学”的基本格局。简要回顾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史就不难看出,传统学术中其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国学”的概念,即使有“国学”一说,其所指的也只是某个“邦邑”范围内的“学校”(又称“庠”或“序”),而非学术。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国”之一语从来没有成为“学术”的某种限制性指称,中国古代的学人也从来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国”与“学”之间会发生何种必然的联系。

“国学”的真正出现是始于“西学”的强势冲击。余英时、姜义华等人曾考证,“国学”一词最早其实是来源于日本。幕府末年与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了抵制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而开始主张将学术全面转向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发扬,他们自称这个时期的日本古典文化研究为“国学”。日语“国学”一词后来为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所借用,才转而特指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自章太炎等人倡导“国学”开始,到现今所谓的“国学复兴”,其间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

阶段为 1904 年前后,以章太炎在日本开讲《国学概论》及刘师培等人组织“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为标志。这个时期的“国学”与“国粹”基本同义,而且带有非常浓郁的以“学术”来实现“存国保种”之使命的特定色彩,藉此亦可与晚清时代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等各个层面均已日趋普遍的“西化”倾向相抗衡。值得注意的是,章、刘等所称的“国学”虽然已经初步具有了“地域”和“族裔”两个层面的蕴涵,但是与“政权体制”划清了严格的界限。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始终是以“依附”的方式托身于“政权体制”(政—学合一)的庇护的话,那么,自章、刘所倡导的“国学”开始,“学术”与“政体”之间则出现了明显的切割,也即“学术”已经有了努力寻求其自身独立地位的迹象,这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国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五四”以后,其标志是 1923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及《国学季刊》的创刊。由于胡适等人的努力,“国学”研究开始全面转向对于既有“国故”的重新整理,即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国故”一说仍是源出于章太炎,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毕竟并非都是“精粹”,称之为“国故”更为妥帖一些。胡适对此的解释是:“‘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很多。……如果有人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整理国故”时期的“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能够在继承章氏等人的学术独立意识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以便重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面貌,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论”向度上的努力,因为“整理国故”的另一个潜在的动力实际是来自西方“汉学(Sinology)”的挑战。也就是说,“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使“国学”本身完成了从传统形态的“立命立身之根本”逐步过渡到与“西学”具有平等地位的“知识”之一的角色转换;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使“国学”最终有了与西方“汉学”乃至整个“西学”的知识序列相呼应并展开对话的机会,这在相当程度上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学人自身的学术自信,使中国学人不至于亦步亦趋地紧随“西学”的途径前行。如果说章、刘时代的“国学”倡导和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还都是在学术自身内部渐次发生的话,那么,此后的所谓“国学”热潮则开始逐步向生活实践层面滑行了。第三阶段的“国学”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代表

性的事件包括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成立(1929年)、由《教育杂志》发起的有关“尊孔读经”问题的讨论、由民国政府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以及萨孟武、何炳松等人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等等。这个阶段的“国学”研究活动中开始出现了“政权体制”积极介入并参与合作的身影,单纯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开始从“知”(一般知识)的范畴向“行”(行为规范)的范畴渗透。但事实证明,试图以一种古老的道德诉求来规范甚至改变现代人的生存形态,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有政权体制的强力干涉,所取得的也多半只是表面上的形式效果。第三阶段“国学”热潮的唯一成果,也许仅仅是以中央研究院和各高校的“国学院”为代表的专门学术机构最终获得了政权体制的认可和保护。这类机构虽然已经完全丧失了为政权体制提供任何思想资源的功能,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类专门机构的存在,才为“国学”本身的“知识化”路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国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是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谓“国学复兴”,其标志就是海外“新儒家”的重现、文化守成主义的复活、官方对“国学”研究的大力支持,以及高校“国学院”的普遍复办与兴办等。

有不少学者认为,“国学”复兴热潮是一种典型的反现代性的复古思潮,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填补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所留下的某种空白,它非但无助于现代性在中国的持续展开与最终完成,甚至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一种阻滞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障碍。此种看法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在章太炎倡导“国学”的时代,“国学”确实是有着明显的反现代性的倾向的。但具体说来,笼统地视“国学”热潮为一种“逆流”性质的复古思想,并认定其会导致现代中国社会的某种停滞和倒退,也许是有些过于夸大“国学”自身所具有的功能了。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当下环境中持续已久的所谓“国学热”,其实跟股票热、理财热、购房热等一样,不过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经济活动”而已——以“国学”名目出现的种种热潮都可以看作是“文化产业”形式的一种,其最终目的也主要是经济利益而非思想建设本身,其于“国学”非但无益,反而可能滋生某种有害的倾向。从学术层面上讲,海外“新儒家”的出现,国内文化守成主义的复活及“国学院”的普遍兴办等等,大都仍旧是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整理工作,整理和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使之成为人类所创造的某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一种。既然这种知识早已经彻底失去了为政治意

识形态提供合法依据的有效功能,那么,借助于纯粹学术层面的研究使之成为人类的“知识遗产”之一应当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再从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上来看,即使有官方以权力形式来大力推进“国学”知识的普及,也已经不大可能会有人真正依据某种古老的道德原则来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了,因为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日渐推进和发展,作为一种专门类型的“知识”,“国学”所蕴涵的诸多核心原则早已经失去了其在实践层面上所必需的文化生存语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日常生活中与“国学”相关的诸多名目实际上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娱乐化”与“戏仿化”的色彩,这似乎恰恰显示出了某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对于“国学”之所谓“立命之根、立身之本”之类核心理念的彻底“解构”。在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崇高和严肃可言的社会环境里,“国学”所赖以立足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现代人的行为及生存方式产生有效的影响呢?

“国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已经确定了其与中国传统的“经学”所特有的功能之间的深刻差异。如果说章太炎和刘师培时代的“国学”还只是初具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雏形的话,那么,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则使“国学”初步确立起了独立的学术品质,并使这一特定的称谓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一国之学”的代名词。当知识分子最终摆脱了传统的“政一学”一体的生存格局,而以学院、阅读、写作等方式实现了全新的生存形态的转换时,学术自身之独立地位的确立就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学”对于其在“地域所属”与“民族种性”等基本层面上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强调,恰恰就是为了能以其对地缘特性与民族特性的凸显,来规避和矫正学术自身片面西化的普遍倾向。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将“国学”从单纯的“复古化”和“娱乐化”等途径上重新导入真正“知识论”的学术视域,以还原其本来的“知识学”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成为“国学”的有效载体,因为这里所说的“国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共同体”的标识。非但如此,正如欧美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研究一样,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中国所产生的新的哲学、美学、语言学、文学、宗教等文化产品,也都可以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现今所谓“国学”毕竟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经学”或“理学”的衍生物,而已经被扩展成为与域外族裔相区别的特定文化形态的专属概念了。张岱年先生就曾说过:“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

还应该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只要“民族—国家”这种历史形态仍然存在,“国学”的概念就无法自行消逝;也只有将“国学”视为一种具有更为广阔的包容性的学术范畴,“国学”才有可能在人类整体的知识序列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编辑例言

一、本丛书根据“国学”思潮在不同阶段的核心趋向分为“国学初萌”、“再造文明”、“中西会通”和“返本开新”四辑,大体依历史演化为线索,以选辑主要人物的代表性论述(论文或论著的节录)为主。

二、本丛书所选辑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由刘修业、侯植忠等前辈学者编写的《〈国学论文索引〉全编》(未选入之篇目也可参照此著另行查阅),文字以杂志初刊或著作初版的原始文献为准,参考现有各式全集、文集、选集及相关研究论著予以校勘核正,学识浅陋,误讹难免,恳请指正,以求完璧。

三、所选早期文献因多为竖排旧版,且句读不一,为方便阅读,均以现有通行横排及标点重新处理,文字中原有繁体、异体已改为简体,原文献中有明显错误的文字也由编者据相关资料作了校正及说明,个别文献由编者自行据上下文意粗略作了段落划分,若有不妥,还望批评。

四、原文献有夹注者,均以括号“()”重新标示,原文之有引文者则改以不同字体作为区分。

五、为使编例统一,节录自著作的文献,原有章节编号已由编者作了重新标号。

六、选文末尾附识简要文字,均为编者一己之感,谬见多多,祈愿求教于大方。

目 录

总 序	1
编辑例言	1
张尔田	
与人论学术书	1
陆懋德	
论国学的正统	4
熊十力	
为哲学会进一言	7
读经示要节录	12
冯友兰	
论“比较中西”	20
读经尊孔与提倡理工	25
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	2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29
金岳霖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33
梁漱溟	
论学术内涵及其分类	37
马一浮	
泰和会语节录	42

汤用彤

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节录	47
------------------	----

甘蛰仙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	50
--------------------	----

钱 穆

国学概论·弁言	74
---------------	----

太炎论学述	75
-------------	----

中国学术通义·序	88
----------------	----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	92
------------------	----

《新亚学报》发刊词	96
-----------------	----

张君勱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	102
--------------------	-----

徐复观

复性与复古节录	116
---------------	-----

唐君毅

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	122
-----------------	-----

牟宗三

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节录	137
----------------------------	-----

牟宗三等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节录	157
-----------------------	-----

刘述先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节录	194
------------------	-----

当代新儒家思想的批评的回顾与检讨	208
------------------------	-----

杜维明

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	221
-------------------	-----

李泽厚

新儒学的隔世回响	230
----------------	-----

余英时

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239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264
略论中西知识分子的源流与异同	278

张岱年

说“国学”	287
-------------	-----

张尔田

与人论学术书

辱书,不以愚之狂言,而弘壤流之纳,匪惟学者态度宜然,益足彰先生谦德也。愚尝谓以嵇向之交,而养生设难,如临大敌。以韩柳之契,而子厚责退之修史,俨若严师。古之人师友之间,亲行之而不以为忤,何则?学问天下公器,非一己所得而私也。今何幸乃于先生见之。自顷以来,圣文埃灭,人尚流竞,发扬蹈厉之风扇,而宁静淡泊之志寡。古之学者,其病征在不及;今之学者,其病征则在过。以物理言,脑充血症即是脑贫血。故过也者,不及之表见也。生物原则,始于浑者终于画,胎于合者卒于分。浑者盛之萌,画者衰之诊,合者生之机,而分者死之候。大易之象,凡刚柔交错者卦皆吉,而阴阳睽孤者卦皆凶。故孔之术曰用中,老之术曰守静,墨之术曰上同于天。盖天人之际,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者以为大可惧也。人之籀物,恃乎官能,官能者有涯之器也。以有涯之器,而日逐无涯之真宰,其终也,未有不蹶者。吾闻纬家之言曰:人之一生,曰始,曰壮,曰究。人类之大齐亦然。意者民之智也日浚,其邻于种之究也益迫乎?今也谓古哲戒律为无所用,而不惜一切溃焉以自为方,然且美其名曰进化,此吾所大惑不解者也。学之启也何朕乎?亦曰征服自然而已。科学之所以研究自然者,征服之备也。夫自然之云,苞物与我而言之。今也尽征服宙合之物,而反忘自身亦宙合之一物,举古之人所为检束官骸性命者,摧陷廓清,比于武事,豢贼于室,而外御其侮,胥天下不至尽返乎原人不止,然且美其名曰解放,此又吾所大惑不解者也。自古圣哲所以异于庸众者,必有一大目的,而后道术从而生焉。虽其所术不一,而目的则同。故儒墨名法,交相用而皆足相济。譬诸粟焉所以疗饥,药焉所以治病,疗饥与治病其目的,而粟与药也者,则所以达此目的之用也。是非所在,不在粟与药,而在粟之是否可以疗饥,与药之是否可以治病。是故必有目的,然后所用以达此目的之术,始有研究之价值,非是则盲从而已。今之崇拜种种新主义者,听其言,非不娓娓也,核其实,

大都感于时与境之不得不然。至诘以最终所抱之目的何若,殆无一人能答吾此问者,更何论乎研究,此尤吾所大惑不解者也。宇内三大文化,曰远西,曰印度,曰震旦。三者物极将反,至今日几几有不能支配世界之势,未必彼之为是,而我之为非。为功为罪,自有末日最后之裁判,固非我辈今日所可妄下断语者也。虽然,我辈中国人也,国学真精神、真面目,我辈自当发挥之,以贡饷于世界,而断不可以远西思想先入之说进。有先入之见,则吾之国学非吾之国学矣。休宁高邮,所用以考核经史之术,其有合乎科学方法与否,吾所不敢知。即谓其全合乎科学方法,以国学方面之多,有断断非仅恃乎科学方法所能解决者。考据之学,自是一家。我辈生千载后,而上读千载古人之书,比于邮焉。此特象胥之任耳,故东原自詈舆夫。今误认舆夫以为乘舆者,吾不知战代庄墨荀孟诸大哲,无考无据,又将何以为学也。考据家所凭以判是非者,厥维证据。然学之为道,固有不待验之证据,而不能不承认其成立者。印度古因明学,有所谓譬喻量者,不识野牛,言似家牛;又有所谓义准量者,谓法无我准知无常,如孔子之答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之辟许行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墨子之非攻曰: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辨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辨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可为知义与不义之辨乎?诸如此例,古人多有。此皆无需乎证据,而又无从示人以证据,但以量相衡,则观之者,亦未曾不相悦以解。若必谓证据不可无,而证据之中,有真伪焉,又有强弱焉,果孰从而核之,又孰从而定之。然则谓休宁、高邮之术,为今日治国学者无上方法,殆所谓能胜人之口,能易人之虑,而不能服人之心者欤。愚非谓考据果可废也,考据之所贵,在能定古书之音训,及其名物度数之沿革。而诂其正义,探赜索隐,固匪所长,而义必以名学公例审谛之,去其所谓便词巧说者,乃尽善耳。然而晚近学者,则多偏重于彼而略于此,见有可与远西相缘饰者,则相与诧之曰:科学方法。呜呼!为此言者,不特不知休宁、高邮之术,抑亦不知科学也乎。天下学术,争辨相寻,必综合然后是非乃见。惟其用以研究学术之方法,则必须有一标准焉。苟无标准,或标准而不能正确,综合时,即无由比较。此则庄生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之不相为谋而已矣。愚怀此也有年,度今之人,无敢为此言者,亦无有人肯定此言者,故聊复为先生一倾吐之。春寒惟餐卫纳宜,不尽愿言。

(原载《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8月)

“亚洲学术研究会”为清季旧式学人1922年成立于上海之小型学术团体,发行《亚洲学术杂志》,分论说、专著、文苑、丛录、译稿诸栏,由孙德谦主编,汪钟霖、邓彦远协理,计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积极参与。宗旨崇“六体”、“八用”,“六体”谓:“主忠信以修身,尊周孔以明教,敦睦亲以保种,讲经训以善世,崇忠孝以靖乱,明礼让以弭兵”;“八用”涉及亚洲人之性情、政治、道德、法律、体俗、和平、教学、文化各方面之研究。倡导“将我亚洲旧有之学术,发明真理,著为专篇,以备世贤之研究,不过事高论,亦不为陈腐之谈。凡琐屑之考据,空疏之议论,皆在所摈弃,于近今学说之背谬者,则辞而辟之”。吴宓有赞:“每篇皆言之有物,精粹确实,不事敷衍补缀,其方法亦甚允当,虽专事发明经义,整理旧学,然处处针对时势,以实用为归。”张氏论学虽不离旧宗,且鄙科学方法一途,然提醒治学不可尽弃旧路,前贤之劳而有功,继绝抑有可资取者,勿置轻视。

论国学的正统

吾国旧有的国学，本是有体有用之学。昔人所谓“穷经致用”，所谓“经义治事”，皆指此而言，此实为正统的国学，历代各有其人。直至晚清之曾国藩、李鸿章，尚不能出此范围。不过自民国初年以来，一时学者忽倡“为学问而治学问”之说，由是全国风靡，群趋于考证名物，而轻视明体达用。真有如汉人所谓“讲说曰若稽古四字而至数万言”者。此固是国学之一端，而究非国学之正统也。余昔年在北京时，深知其流弊，然言偶及“明体达用”之学，不但不为人所采用，而反为人所讥笑。三十年来，人才寥落，及乎国家有事，欲求一曾国藩、李鸿章之人物，亦不可得，斯即讲学之失有以致之也。

吾国昔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此即正统的国学之最高目的。然所谓“内圣”，不过指修养而言。所谓“外王”，不过指致用而言。如是言之，亦非神妙不可几及之学也。譬如有人于此，在内有相当之修养，在外有致用之才能，斯何非一有用之人物？然二者皆不可偏重。西汉之人偏于致用，南宋之人偏于修养，而其末流均无全才。今世非无过人之人才，不过缺乏修养者，则用其智能于谋财利己之事；而不知致用者，则弊其精神于考据名物之中，斯其所以无全才也。南宋之末，谢翱羽谓彼时“欲求一瑕吕诒甥而不可得”。瑕吕乃《左传》中的人物，岂可易见？吾辈在今日，虽欲求一曾国藩、李鸿章而不可得矣。

国学本有道、儒、法三派。管、老之书，既无法能证为孔子以前之著作，则谓此三派之成为学派，皆在孔子以后，亦无不可。历代之人才，大约不出此三派，而实皆导源于孔子。例如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在汉有董仲舒，在唐有陆贽，至明而有王守仁，此所谓儒家者流也。子夏传荀卿，荀卿传韩非，在汉有诸葛亮，在唐有姚崇，至明而有张居正，此所谓法家者流也。子贡传田子方（据《吕氏春秋·当染》篇），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在汉有张良，在唐有李泌，至明而有刘基，此所谓道家者流也。此等人才，代不乏人，凡此皆是“内圣外王”之